

李 贽 传

鄢烈山 朱健国 著

时 事 出 版 社



传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贽传/鄢烈山, 朱健国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ISBN 7-80009-565-7

I. 李… II. ①鄢…②朱… III. 李贽-评传
IV. B24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755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80 元

引 子

农历三月的北京，北风已不那么如刺如割。御河桥下的冰凌化了，棋盘街旁的杨柳青了。可是，天宇京畿的百官万民，心头重压的冻云不开，胸中拥塞的积雪依然。从庙堂重臣到市井蚁民，人们抹不去一个不忠不孝的念头，暗暗祈祷：但愿宫中“酒色财气”四病俱全的皇上快快伸腿！新皇儿登基，多少有一番“与民更始”，人也许就可以喘几口气了。

这是公元1602年，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已翻了三十次，史称“万历三十年”。如果有人要纪念，这一年是张居正十年改革失败的二十周年；这一年是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四十九周年。三十八年后，地球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爆发。

本来，二月里已有确凿消息风走紫禁城内外：万历皇帝早晚工夫就要驾崩了。

消息说，二月十六日，朱翊钧忽感病势沉重，急召诸大臣到仁德门候旨，并命首辅大学士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听他安排后事：“朕病甚，勉辅太子。这些年因为修建三大殿而征收矿税，本是权宜之计。现在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停勿征；所遣内监，都撤回京师。镇抚司和刑部关押的罪人可以开释；过去进谏得罪降谪的官员，都给他们复官吧。”说罢便躺下等着断气。晚上，内阁大学士们及三公九卿一起朝房守夜，翘盼丧钟。沈一贯代似的遗嘱，业经朱翊钧点头，交诸大臣传阅，行将执行。

可是，第二天，朱翊钧的病情好转，他翻悔了。接连派出二十多批太监，到办事房索缴圣旨。沈一贯奏称：“臣等昨夜值宿朝房时已将圣谕传出，顷刻间播扬四海，不宜出尔反尔。”朱翊钧不听。一旁侍候的司礼太监田义，也力谏道：“圣谕已颁，皇上岂可反汗食言！”朱翊钧怒不可遏，下令斩杀田义。田义毫无惧色，谏诤愈烈。但首辅沈一贯害怕了，赶紧缴出前谕。过了两天，朱翊钧传谕内阁，说是前两天由于眩晕云云，一切“著照旧行”。^①

一场空欢喜。人们又感到了沉重的矿税。

矿税是朱翊钧的“专利”。这位万历皇帝冲龄践位，前十年因首辅张居正严厉地督导，挥霍天性总难如愿。待到成年，世间已无张居正，便一面抄没“张先生”家产，清算其“蔽塞朕聪，专权乱政”，一面纵性肆虐。万历二十四年起，便向全国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收割钱财供其千金一笑。蝗虫般狐假虎威的钦差，所到之处树旗建厂，纳流氓地痞为爪牙，以敲诈勒索为能事，穷富吏民皆不放过。富户不是被诬以盗矿，就是指其良田美宅之下有矿脉，逼其献款；

不论有无矿藏或矿脉贫富，皆强逼富户为承包矿税的“矿头”，再抓贫户充矿役。地方官员也不在这帮黄衣使者的眼里，州县芝麻官不敢阻挠中使，藩司巡院诸方面大员亦不敢稍加鈐束。此外还有查收商税、店税、鱼课、盐税的特使满天飞，飞得举凡舟车庐舍五谷六畜农工官吏皆为纳税对象。“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袁中郎因此赋《猛虎行》^②诗曰：

甲虫蠹太平；搜利及丘空。
板卒附中官，攒簇如蜂踊。
抚按不敢问，州县被诃斥。
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
兵卫与邮传，供亿不知几。
即使沙沙金，官支已倍蓰。
矿徒多剧盗，嗜利深无底。
一不酬所欲，忿决如狼豕。
三河及两浙，在在竭膏髓。

如此穷凶极恶的折腾，惹得民怨鼎沸，恰如刑部侍郎吕坤所言：“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③

这番形容当然有大量事实支持——

万历二十六年，宦官陈增监山东矿税，凿山民夫多死，又逮及代纳税款稍缓的吏民，民众大哗……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聚众四千，驱逐税监马堂，毙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黄州团风镇民众轰走税监陈奉的

徒党……

万历二十八年，京畿兵民苦于连年旱灾、矿税，群起而盗；浙人赵一平招集流民结党，伺机举旗造反……

万历二十九年，武昌民众数万人围攻税监陈奉官舍，投其徒党16人于长江；苏州织工葛贤带领市民包围税监衙门，乱石打死税使孙隆的参随黄建节，焚毁帮凶汤莘的居室……

就在朱翊钧食言而肥的当日，江西又发生民变，景德镇民众烧毁了税使厂房，儒生们怒殴矿监潘相……

尽管民怨鼎沸，报警的羽檄联翩而至，万历皇帝却无动于衷，坚持照既定方略办。

朝野士大夫忧心如焚。那些不怕丢官杀头的便前仆后继上疏劝谏。二十五年吕坤上疏陈天下安危，请缓催科撤苛税，以收人心，防止人民“悉为寇仇”；二十八年凤阳巡抚李三才更是痛心疾首慷慨陈言：

“自矿税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拿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急，惟利是闻。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指他从二十一岁起就大搜民财修造陵墓），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为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斗升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乱者哉！”^④

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与六部九卿大臣会疏纠劾宦官

酿乱，毒害天下，恳请召还中使，罢除矿税。

不管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朱翊钧自有妙术：进言任你进言，朕自留中不发，赐尔自生自灭；你若化清淡为行动，大胆行阻，那就轻则罚俸、撤职，重则打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一时间诏狱中人满为患，因建言及忤监矿税使的犯官，滞留未及时发遣的常有一二百名。^⑤

朱翊钧为何一意孤行？有两种说法。一曰他根本不相信大臣们的危言耸听。千古一局，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在这么过吗？有几股刁民闹事、有一些地方造反，有什么大不了的？本朝太祖英雄盖世，体恤民情，夙兴夜寐，但终他老人家一世，哪年没有几起乱子？仅《太祖实录》记载的就有一百二十多次！武宗北“征”南巡，游龙戏凤，北虏窥边，宗室造反，暴民骚扰京畿，不也照样稳坐龙廷？他又怕什么“百姓不肯为朝廷屈也”！一说他是故意和大臣作对怠工。他久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常洵取代长子常洛为太子。可恨朝臣群起而谏，誓死反对这有悖孔教的废长立幼。回忆嘉靖元年，先祖世宗过继登基，想按天伦仍称父母为爹娘，群臣却逼其称叔父武宗为爸，因为帝位是武宗所传。世宗不乐，一场“大礼议”斗争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闹得庭杖飞血，百官哭谏，皇上气短，道士入阁，终于是两败俱伤。前车如此，朱翊钧也只有罢了。但这一愿望不能实现，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便终日悒悒寡欢，那往常“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快乐便一去不复返。想到虽然贵为天子，却连立太子之事也不能随意，朱翊钧对朝政人世便厌倦无心。这一厌倦，他就二十年不早朝，不见大臣。从万历十七年以后他懒得上朝了，内阁大臣想见他就难于上青天。尤可骇怪，史无

前例，政府机构的人事任免章奏他也置之不理，以致万历二十七年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⑥许多衙署的正常运转陷于瘫痪。

然而，朱翊钧虽然是个又贪婪又怠惰的昏君，却对思想文化领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像个困卧在洞里的恶狼，一旦发现了“敌情”，便本能地冲出去张开血口。

这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礼科都给事中（七品言官）张问达上疏，弹劾二十多年前已从姚安知府任上退休，现居京郊通州的李贽：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因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掠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李）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

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北京与留都南京）及各布政司，将（李）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勿令贻乱于后，世道幸甚！”^⑦

已经多年不问政事的朱翊钧，这时却极其勤勉，一看到劾疏的题由，便将珍宝古玩、俚曲杂说统统推过一边，聚精会神地看下去。

李贽这个人物他是早有耳闻的。虽说躲在重城深宫，靠着侦伺的锦衣卫和东厂特务无所不在，上至王公贵族的府第、三公九卿的宅邸，下至市井的茶楼酒肆、山村的野店荒寺，有什么大的异动变兆他都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个李贽前两年在南京讲学，一帮学子士绅趋之若鹜；去年移居通州以后，燕薊人士亦望风礼拜。此人“所至倾动”，有“大教主”之盛名，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可低估。若听任这样的人传播异端邪说，败坏人心，将比聚众滋事火烧几所衙门，占山为寇攻掠几座州县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防大乱于未萌，绝不容许开创蛊惑世道民心的先例！他虽然因种种烦恼，想以吃喝玩乐报复朝臣，但大明江山还是要坚决传下去的，他决不做亡国之君。

自从“看穿”了张居正的真面目以后，朱翊钧压根儿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公忠体国”的臣子和光明正大的君子，对言官的奏疏更是满腹狐疑。他当然明白张问达指责一个七十多岁的病衰老头勾引女人是无稽之谈；把麻城无赖少年明劫人财强接人妇的流氓行径都归咎于李贽乃深文周纳，就像把京城的流氓犯罪都归于公卿大臣教唆一样荒唐；至于

说缙绅士大夫有诵咒念佛的，只要他们言行规矩恪守臣道亦未为不可。皇太后就喜欢烧香拜佛嘛，他从小陪母后礼佛还少吗？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这个李贽竟敢口吐狂言，与列祖列宗唱反调，说孔夫子的是非标准不足为据！如果臣民们都不信孔子的教训了，不循礼教，不守名分，不忠不义，上下相侵，尊卑失序，天下还能姓“朱”吗？

他并不像平常去猜度这奏折后面有什么人事纠葛，也不消理会勾引妇女这类诋毁名誉的惯用伎俩，而是高瞻远瞩，抓住政治要害，写下朱批：“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厂即由太监领导的特务机关东厂，卫指担负警卫和侦缉任务的御林亲军锦衣卫，五城系维持京城五个城区治安的宪兵衙门‘五城兵马指挥司’）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一）并治罪。”^⑧

这个批示是异乎寻常的。请求勅治某人的奏疏，一般是有意从严议处的，以便给皇帝显示宽大为怀优恤臣工的机会，皇帝一般对拟议的惩处从宽减等发落。可是，这个批示却比张问达的拟议要重得多。张问达只请求由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回原籍，朱翊钧却下令将李贽列入最高级别的要犯，由宪兵特务缉拿，打入“天牢”候审，而且还有严查著作言论的命令。

这个批示是于法无据的。《大明律》虽有“谋反大逆”、“谋反”等罪名，李贽却是公开讲学，公开印行著作，与“谋”（阴谋）毫不沾边。《大明律》虽有“造妖书妖言”的罪由，但那是指秘密结社（如兴立白莲教之类）所编造的“预言书”、“天书”以及教规教约等，并没有以著述和学术

言论治罪的条款。张问达即便想置李贽于死地，他也想不出可援之法。

中国三千年文祸连绵不绝，但纯粹以思想言论治罪，严惩一个举国知名学者，实在史无前例。桀诛关龙逢，纣挖比干心，皆因“处士干政”；秦始皇坑儒，只因卢生、侯生以假长生术骗他；尔后“狄山死于主和之议”，“颜异命丧‘腹诽’”，“司马迁遭李陵之冤”，“窦太后排儒”，“董仲舒、眭弘妄论得祸”，“曹操借刀杀祢衡”……均非以学术思想获咎。就是北宋禁过苏轼诗文，南宋禁过朱熹“伪学”，也只因为他们卷入了官场权力之争的政治漩涡。查禁著述只是恨屋及乌的由头、手段。至于本朝英宗正统年间查禁《剪灯新话》，主要是这类坊间通俗流行小说太迷人，妨碍经生儒生诵习功课。查禁时《剪灯新话》作者早已作古，对别的作者也没有费心追究。

封建中国从来就不是法治国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朕即法律，“口含天宪”，朱翊钧有什么必要考虑有无法律条例呢，他只要记住自己是皇上就行了。纵然是学术思想，只要朕不喜欢，就可以灭他九族。“一言丧邦”，谁说异端学术不会颠覆紫禁城？

当然，他也还是尽量“师出有名”。“惑世诬民”这罪名就是从朱文公那里借来的。朱熹在《大学章句》序言里表白，他著此书就是为了扫除形形色色“惑世诬民”的异端邪说，以便后人“极知僭逾无所逃罪”。

普天下应知，这个李贽何其大逆不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汉魏六朝、隋唐五代、两宋胡元，乃至大明政教合一，一千七百余年来，谁敢公然侮辱孔圣人，诋毁夫子的经典

不足为万世法？墨子、庄子、韩非子、王充、刘知几虽然曾讥刺过孔子，但谁也没像李卓吾这般放肆，要把圣人整个推倒。建国初期，祖宗立下千秋万代不易之规，令儒生苦习《四书》、《五经》，“一宗朱子之书”，以朱程的传注解释为准，开科取士，凡悖孔离朱妄立论者，一概弃斥不录。李贽却道《六经》、《论语》、《孟子》是道学欺世的口实，假人藏身之渊藪；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不必取给于孔孟，只要凭真心顺本性为人立世就好。朱夫子更是他挖苦的一碟小菜！忠孝节烈，千年铁案，他肆无忌惮地掀翻；篡国危主的乱臣贼子，他敬为智谋名臣；自媒淫奔的妖妇贱女，他颂为善结良缘……这样逆忤名教的旷古罪人，不即日严惩，更待何时？

朱翊钧的诏谕发下去了。与李贽交往多年的文武官员，并无一人上疏论救。

三月三日，到底来了两个奏疏。一个是御史康丕扬上的：“不逐李贽，无以端天下之习……”^⑨一个是礼部尚书冯琦的，他首先称颂“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为）崇正辟邪之盛举也”！然后恳请扩大查禁范围，凡借佛典禅语“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背弃孔孟，非毁程朱”的一切生员人等及新说曲议，统行黜革或烧毁，概不姑息。^⑩

懒散的万历皇帝这次又破例“马上就办”，当即“钦此”——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彰宋儒。近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

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益），可开列条款奏来。”

大吏们开来了一长串名单，但皇帝还是英明仁厚的，“首恶必办”之外，其他暂且从轻。他不愿因李贽株连修道信佛之人，他主张，“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⑪

于是朝廷百官的义愤一致对准李贽。尽管口口声声“敬天法祖”的大人们知道，如此严惩一个异端思想家，这是华夏旷古没有的事体。

一道圣旨，自然激动了一队锦衣卫，紫禁城至通州的古道扬起滚滚黄尘。^⑫

七十六岁的李贽，此时正寄居在通州城北门外马氏庄马经纶家。

前监察御史马经纶七年前上疏冒犯龙颜，被削职为民。马经纶久仰李贽，年初专程把卓吾先生从商城接来府上养病。

数月来李贽病势日见沉重，僵卧床榻，只有一口呼吸不匀的气息。他自料不久于人世，已在二月初五口授遗嘱，向随侍弟子、朋友安排后事。

这一日，病房里的弟子无端匆匆进出，嗓音低沉而慌张……李贽在迷糊中感到出事了。他挣扎着叫来马经纶。马经纶无法隐瞒。只好实告：锦衣卫来了！……

李贽好像早就等着这个时刻，猛地双手撑床坐起，大声说：“这是为我而来的！”

他勉力下床，向房门口走去。才走二三步，虚弱的身子

支持不住，摇晃欲倒，有泪不敢垂的马经纶急忙搀扶住李贽。李贽喘息道：“给我取块门板来。”

李贽刚躺到门板上，锦衣卫便冲进来了。李贽吩咐抬门板的马家仆人：“快走！我是罪人！不能在此逗留。”

马经纶要同李贽一同进京。

李贽瞪眼道：“您是被放逐出京城的犯官，岂能再进京城？家里还有高堂老父，岂可枉送性命？不要痴当傻瓜！……”

马经纶说：“不。先生既是朝廷的要犯，我就是隐藏要犯的同案犯。与志士同死，人生一大幸也。‘微斯人，吾谁与归’！”

一向骄横跋扈恶如豺狼的锦衣卫校尉，目睹此情此景，一时也默默无言。

一行人抬着门板上的李贽向西走去。走不多远，数十名马家仆人追来，奉马老太爷之命，挡道而跪，泣求马经纶不要自投罗网。马经纶义无反顾，扶着门板，守护着李贽向京城诏狱进发。

路途颠簸，半道上李贽就昏迷了。当日抵达监狱时，脉息已很微弱。

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是奉诏关押钦定要犯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为“诏狱”。这是一个人间地狱的创举。“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阴光森兮，腥臭窒兮，十八种大刑如虎嚎狼咆，此伏彼起。解缙、杨最……本朝多少名臣人杰先后惨死其中。

第二天提审，李贽被半掖半拖地带到大堂。躺在冰冷的石阶上，似乎死去的他，又渐渐苏醒过来……

这个短暂的偶然，竟成了一个伟大的预言，一个历史的模型。

几天以后，李贽用一把剃头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真的死了。^⑬

从此他的灵魂躺在冰冷的石阶上，天启、崇祯、顺治……宣统，一躺三百年。

三个世纪后，李贽又渐渐苏醒——

1916年，吴虞在《进步杂志》第九卷3、4期发表《明李卓吾别传》；

1932年，《金陵学报》二卷1期刊登黄云眉的《李卓吾事实辨正》、朱谦之的《李卓吾的思想》；

1940年，容肇祖出版《李贽传记批判》、《李卓吾年谱》；

1946年，《中华论坛》二卷1、2期连载吴泽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

蔡尚思先生1990年6月15日为岳麓书社再版李贽《焚书·续焚书》作序，短短八百字，代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对李贽的最新研究坐标——

李贽号卓吾，明代晋江人。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他思想家所难比的地位。

除了先秦时代，墨子批评孔子，庄子、韩非相对的批评孔子以外；从秦代到近代，对孔子敢有所批评者如王充、刘知几及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报刊、新文化时期诸贤，实在都比不上李卓吾。李卓吾、谭嗣同、李大钊三个大思想家都是为真理而牺牲生命的。但就敢于批评孔

子一个问题来具体分析比较，却可以看出他们有所不同：近代的谭嗣同是尊孔子而反礼教的，他的被害死，是由于主张变法而不是由于批评孔子礼教的。李大钊的被害死，是由于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由于批评孔子礼教的。谭嗣同、李大钊二人的被害死，同是由于政治问题。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学术问题而被害死的，李卓吾便成为唯一无二的一个思想家了。此其一。李卓吾的批评孔子，坚持到七十多岁的高年，也不是梁漱溟所说的，一个人年老，思想就会变成保守的。此其二。李卓吾是死于独尊孔子的封建社会时代，而不是死在封建社会已经动摇或被推翻以后，所以他的为反孔而牺牲生命，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此其三。具此三个特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谁比得上他呢？

.....

蔡尚思先生的这一论断，很有启迪作用。

其实李贽主要是反尊孔，而非反孔；他反的并非孔子本人，而是反对独尊孔子，借孔子之名扼杀异己。他反对的实质是一种述而不作的保守学术，一种人类只能有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专制思维方法。混淆孔子与尊孔者，把二者划等号，这是中国思想界二千年未消除的隐患。许许多多的学术迷雾，都由此而生。

站在这一视角，是否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李贽？

我们希望卓吾先生答复。

到哪里寻找他呢？